

《玉堂春》中的庶民价值观

廖 璐

摘要：双红堂藏清末民初京剧折子戏《玉堂春》，作为根植于民间的戏曲艺术作品，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剧本不仅故事情节吸引人，人物唱白也内涵丰富。它打破上层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体现出下层人民所接受的种种思想。本文试从民间道德标准、社会理想、语言特色方面，探讨京剧《玉堂春》中的庶民价值观念。

关键词：《玉堂春》庶民；价值观

本文研究底本《玉堂春》出自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双红堂文库系日本著名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藏书，藏有四种版本的清末民初京剧折子戏《玉堂春》，本次将“北平打磨厂泰山堂印行本”的《玉堂春》（简称“泰山堂本”）作为研究底本。

京剧折子戏《玉堂春》又名《监堂团圆》、《三堂会审》，传统戏剧剧目，作者不详。取材于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这一折主要讲述玉堂春解至太原，王金龙升堂与布政、按察二司会审此“谋杀亲夫”一案。王金龙得知旧日情人玉堂春的悲惨遭遇后，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遂遭到布政使、按察使二位的嘲讽。玉堂春与王金龙虽已认出对方，但由于存在顾虑，未当场相认。玉堂春被带下大堂，王金龙决定想办法搭救于她。《玉堂春》在清代曾被官方当作禁戏，“在清末民初的很长一个时期，《玉堂春》一剧屡遭禁演。”^①但它却能够在民间得以流传并受到下层民众的普遍喜爱，其中必然包含了能为庶民所广泛接受的思想。本文试图通过发现京剧《玉堂春》中的庶民价值观念，更加深入地理解其作为根植于民间的艺术所散发的魅力。

一、情义至上——民间道德评判标准

笔者将这里的民间道德定义为民间普遍接受的道德观念，与此相对的是正统道德，即被当时统治者所认可的道德观念。正统的道德观念站在维护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的角度考虑，并为其服务。而民间的道德标准多站在人之常情，而非官方利益的角度来评判是非，因此多不同于正统的道德观念。民间道德评判标准因没有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往往更有人情味，是非判断的出发点更具人性化色彩。《玉堂春》中明显体现了以民间道德判断是非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以是否重情义判断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可以忽视社会地位的高低。

（一）对妓女玉堂春的同情

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玉堂春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妓女，受到上层社会歧视是必然之事，但地位卑贱的妓女在剧本中却是品德高尚，值得赞扬的对象。玉堂春不仅外表美丽，而且心地善良，这一切使妓女的固有形象发生改变，民间道德的评判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等级观念，对社会地位卑贱而品德高尚的人采取宽容的态度，更看重的是玉堂春重义轻财的美好品质。这正是庶民思想对上层社会价值观念的解构。王金龙在妓院用尽银两，大雪天被赶出门去，玉堂春毫不嫌弃，私自找到衣衫褴褛的王金龙，赠予银两并互诉衷肠。对于她的这种行为，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对话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观念：

“（布）想那王公子身上褴褛，玉堂春不嫌肮脏，怀中就抱。周仓桌下，叙叙旧情。岂不是义气？”

（按）那里是义气？他那娼门之女，一派做造。

（小生）二位年兄，想玉堂春，本来有义气的。”^②

玉堂春社会地位的低贱决定了她被人轻视，站在上层统治阶级的角度，妓女这一身份颇带贬义，前门送旧，后门迎新是妓女的普遍做派，难以把她们的善良真诚的品德联系在一起，就算有什么重情义的举动也不过是在作秀，正如按察使所说的“她那娼门之女”毫不客气地流露出轻蔑之感，而“一派做造”更是抹杀了她的善良之举。但庶民就出于社会的底层，在一定程度上自然淡化了社会地位的高低，于是，固有善恶观念的评判标准发生改变。在庶民看来，玉堂春妓女地位的卑微并不能掩盖她对王金龙的真实情感，这种真情被认为是可能存在并被认可的。剧本借王金龙之口肯定了玉堂春重义轻财的品质：“想玉堂春，本来有义气的”，反驳了按察使的话，肯定了玉堂春的重情重义，是下层庶民价值观念的体现。

（二）对王金龙重情义的认同

剧本在对待王金龙的态度上，同样有打破等级观念的痕迹。王金龙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他与玉堂春一样，拥有情义至上的思想。首先是王金龙爱上玉堂春以后，甘愿在妓院花掉大量银子。地位卑贱的妓女本就处在一个被玩弄的地位，而王金龙对玉堂春却不是如此，他真心相待，哪怕倾尽所有。这种做法本就不为正统思想接受，一个吏部尚书的之子，不潜心求取功名，在妓院里耗费时光，完全属于玷辱祖宗门楣，难以为正统思想所容。剧本中藩臬二司的争论正代表了官方思想和民间思想的冲突：

“（布）想那王公子，初次进院见面，银子三百两，吃杯香茶就走。你我看将起来，可以算得大大的嫖客了。

（按）那里是嫖客，分明王门中出了败家之子。

（小生）二位年兄，以我看来，可以算得一个嫖客。”

王金龙的父亲是吏部尚书，在朝为官，甚是荣耀。因此王金龙嫖妓的做法在按察使看来更具严重性，他认为王金龙连一个嫖客都算不上，顶多是个败家之子。而布按史和王金龙自己的话却认为至少也算一嫖客，对这种做法抱以相对宽容的态度。

其次，王金龙搭救落难的玉堂春亦是重义之举。王金龙在与玉堂春重逢之时，他已经由落魄公子变成了八府巡按，而玉堂春由一个妓女变成了阶下囚。如果搭救玉堂春，就会将自己之前的一段在上层社会看来颇不检点的风流韵事暴露出来，不仅会被当朝同僚耻笑，甚至可能影响自己的仕途。为了一个妓女影响自己大好前程，这种作法在上层社会看来没有必要。但王金龙还是决定凭借自己的权力为玉堂春平反冤狱。上层社会注重门第、等级，而在王金龙身上，这种上层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偏移，他同情地位卑贱的弱者，念在和玉堂春旧日情谊的份上搭救于她，其中流露出的是轻名重义气的庶民价值观念。

二、冤案昭雪——下层庶民的社会理想

《玉堂春》一折主讲三堂会审玉堂春，似乎只是三位大人的审问和玉堂春的哭诉，然而这一折却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玉堂春的冤案从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命运不济，先被无情无义的鸨儿欺骗卖给山西沈洪，后沈妻皮氏下毒致死沈洪，嫁祸玉堂春，才有了这般冤案。但造成冤案的最终原因并不像表面这么简单，玉堂春与堂上大人的对话，已透露出冤案发生的关键原因，即官府贪赃枉法，社会黑暗的现实状况。庶民处在社会底层，是这种现实的受害者，他们渴望清廉的社会风气，能使他们有公正的待遇。王金龙作为清官为玉堂春平反冤案，正是庶民社会理想的体现。

（一）刺贪刺虐，抨击腐败

《玉堂春》在讲述王金龙和玉堂春曲折爱情故事的同时，也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被卖沈家，遭到沈洪之妻皮氏的陷害只是玉堂春坎坷命运的一个导火索，不公正的社会才是造成玉堂春落难的根本原因。试想如果衙门长官都为官清廉，断案公正，皮氏一千人又怎能有所欲为？玉堂春的倾诉中提到了衙门因受贿，酿成冤狱：

“（按白）头堂官司怎样审法？”

（旦唱）[摇板]头堂官司审得好。

（布白）这二一堂呢？

（旦白）就变了心。

（同白）怎样变心？

（旦接唱）王知县贪银一千两。

（同白）众衙役分了多少？

（旦接唱）众衙役分了八百银。

（同白）可曾提出对审？

（旦唱）[流水板]上堂来先打四十板。

（同白）可曾招认？

（旦唱）皮鞭打断数十根。

（同白）打死你也不该招认。

（旦唱）犯妇本不当招认，无情棍棒难受刑。”从这一段唱白中可以看到玉堂春蒙冤受屈的主要原因。“头堂官司审得好”为何第二堂官司就“变了心”呢？其中转变的重要因素是一个“贪”字，官府受贿

以后，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不由分说，上堂来先用刑。玉堂春虽不愿认罪，但难逃酷刑，最终屈打成招。这一段不仅是玉堂春对悲惨命运的诉说，更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强烈控诉。在贪污腐败的社会风气之下，庶民的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维护，玉堂春的哭诉正是下层庶民被压迫的写照。对这种社会不公的排斥是站在庶民利益的角度考虑的。

（二）惩恶扬善社会理想的寄托

社会黑暗、官场腐败，上层社会的贪官污吏从中捞取利益，庶民无权无势，伸冤无路，最容易成为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受害者。“应该说写普通人和下等人的悲剧故事由于他们的表现内容直接体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观众在进行艺术作品的欣赏时，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情感的参与，有着人生经历的某种参照。”^[9]因此庶民在读玉堂春的故事时容易产生心灵上的互动，也更容易在玉堂春的经历中找到共鸣。

从剧本情节的发展看，如果审判官继续徇私枉法，玉堂春就只能命丧黄泉，而这一幕并不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庶民所愿看到的。黑暗现实的压迫自然激起他们对社会较高的期望，对清正廉洁社会风气的向往。庶民希望正义得到伸张，剧本中的王金龙正是伸张正义的清官，他的出现使玉堂春的命运有了决定性的改变，剧情朝着大团圆的方向发展。能有清官出来主持公道表现了下层庶民的社会理想。

另外，王金龙是玉堂春的旧日情人，玉堂春也对他有大恩，因此王金龙搭救玉堂春在情理之中。但实际上玉堂春的命运是不能自主的。如果大堂之上不是王金龙，如果王金龙变心，如果王金龙虽见到玉堂春，但并未掌握能给玉堂春平反冤狱的权力，结局都可能发生重大改变。玉堂春自己也预想到王金龙很可能会变心：

“（全白）那王公子就该来探望于你。

（旦白）王公子他一家多和顺，我与他露水夫妻有什么情？”

但是庶民并不愿意接受悲剧的结局，玉堂春冤案的平反象征了下层庶民的正当利益得到维护，是他们所愿看到的。尽管好结局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但种种偶然性的因素，如大堂上二人相见的巧合，王金龙恰是主审官等，使玉堂春的结局还是逐步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种难以出现的好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底层庶民惩恶扬善、获得公正待遇的社会愿望，不过这种愿望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于是寄托于剧本得以传达。

三、幽默谐谑——语言的民间化色彩

《玉堂春》一折在语言上也颇有特色，大堂审问中穿插着幽默谐谑的唱词和对白，使剧本妙趣横生，带有民间化色彩。这一折主要是讲述玉堂春解至太原，王金龙如何与布政、按察二司会审此“谋杀亲夫”一案的。既然是三堂会审，气氛严肃可想而知，在审判过程中，玉堂春所说话句是实，但门子的不通人情与两位陪审官的失察还是让审判气氛很紧张：

“（小生白）喂，状子上面写的苏三口称玉堂春，途明是个刁妇。

（门子）请刘大人用刑。

（布按）来，扯下去打。

（旦哭）喂喂喂大人哪。”

但剧情的发展并不是一直处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在审判过程中常常穿插进带有戏谑性的文字，如王金龙猛然见到堂下跪着的竟然是旧日情人玉堂春，不由得神昏不定，暂停升堂。两位陪审官看出些眉目，于是用言语试探王金龙：

“（布按）请问大人，还是新病，还是旧病？”

（小生）乃是旧病新发。”

王金龙的回答“旧病新发”，把他当时的窘态描述得淋漓尽致，令人解颐。而当按察使和布政使已经猜到王金龙很可能便是玉堂春所说的那位王公子时，更是加以调侃，言语多带嘲讽：

“（小生）想那王公子时运未到。

（按）那里是时运未到，好把他好有一比。

（布）比作何来？

（按）望乡台上摘牡丹。

（小生布）此话？

（按）分明他死要贪花。”

大堂上正襟危坐的八府巡按王金龙，被形容成“死要贪花”的浪荡子，语言颇带戏谑意味。这种戏谑冲淡了审判的严肃气氛，使紧张的审问不失轻松，情节发展张弛有度。但王金龙毕竟是高高在上的审判官，布政使和按察使是他的下属，下属对上级如此调侃甚至挖苦，似乎有失庄重，并不符合上层社会的道德标准。而这种等级观念对于地位低贱的庶民来说是淡漠的，庶民难以因王金龙作为上级却遭到下级不恭敬的态度感到愤怒，而更易从这些调侃的话语中感受到幽默诙谐的趣味，这种趣味符合他们的价值标准。剧本的语言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带有民间化的色彩，这种谐谑在《玉堂春》中存在并在民间得以流传，同样是庶民价值观念的体现。

京调折子戏《玉堂春》虽只有一折，但情节曲折、内涵丰富，在思想层面上一定程度解构了上层社会固有价值体系，体现了庶民的价值观念。这种庶民观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道德评判标准上讲，对王金龙和玉堂春以是否重情来评判他们质量的高低，社会地位倒居其次，符合民间的道德评判标准；对黑暗现实的反映和对社会的抨击，体现了庶民渴望清廉风气的社会愿望；幽默谐谑、颇带调侃的语言，符合庶民的品位，具有民间化色彩。剧本包含庶民的价值观念，使之受到普通民众的喜爱并得以在民间流传，散发着它独有的思想魅力。（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 [1] 双红堂藏清末民初京调折子戏《玉堂春》“北平打磨厂泰山堂印行”本；
- [2]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秋谷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 [3] 李小花《说不尽的“玉堂春”——从历史流变中看〈玉堂春〉的文学地位和艺术价值》，戏曲研究，2007年2月；
- [4] 张晓燕《玉堂春故事的演变》，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年1月。

注解

- ① 李德生《禁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57页。
- ② 引自《双红堂藏清末民初京调折子戏《玉堂春》，此处为整理本，以下引文皆出于此。
- ③ 李冬茵《中国古典悲剧美学在〈玉堂春〉中的体现》，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6年5月第2期，第49页。

（下接第257页）网络语言已成为文化中不可阻止亦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因此，探讨网络语言对语言及语言学的价值及其翻译方法也是对翻译家或翻译爱好者提出的与时俱进的挑战。本人结合交际翻译理论，初步探讨了“华丽丽”这一网络词汇的翻译方法，强调交际翻译的着重点在于尽可能在目标语中再现原文的意义和语境。（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云南省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基金“桥头堡”战略视阈下云南外语政策研究（Y12018）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新形势下科技英语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2011Y396）

云南省“十二五”教育技术研究课题“E-learning在云南高校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及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 [1] 张惠灵 卢新宇. 网络新词的特点及其英译探析 [J]. 牡丹江大

学学报，2011，（12）.

- [2] 赵越. 网络语言：信息时代的言说方式 [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0，（12）.
- [3] 施春宏. 网络语言的言说价值和语言学价值. 语言文字应用，2010，（3）.
- [4] 王德亮 仲梅. 网络语言：语言史上的一场革命 [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6）.
- [5] 牟玉华 谢旭慧. “网络语言”影响下的汉语、汉字发展趋势 [J]. 山西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 [6] 谢天振 主编.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 [7] 唐丽霞 刘立华. 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视角下的电影片名翻译 [J]. 电影文学，2013，（5）.
- [8]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2376.htm>